

古
夏
分
集
导
读

○ 应守岩主编





应守岩主编

古文 分类导读

浙江古籍出版社

封面题字: 吴战垒

封面设计: 凌瑛如

责任编辑: 蒋金德

古文分类导读 应守岩主编

*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杭州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杭州解放路大塔儿巷 15 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210,000

1990 年 10 月第 一 版

199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

ISBN 7-80518-147-0/I·68

定 价 : 3.00元

主 编

应 守 岩

编 委

孟克晋 闻 乾

撰稿人

(按撰写文体先后为序)

徐汉钟 沈洪保 戴宏法

闻 乾 孟克晋 王绍武

应守岩 韦叶生 朱道初

李 丹 钟贞戊 杜方剑

序 一

自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昭明文选》)以来,历代按文体编选诗文辞赋的集子相继问世。著名的如《文苑英华》(宋李昉、扈蒙、徐铉等编,苏易简、王祐等续修)、《唐文粹》(宋姚铉编)、《宋文鉴》(宋吕祖谦编)、《元文类》(元苏天爵编)、《明文衡》(明程敏政编)、《古文辞类纂》(清姚鼐编)等等。这些选本将古代文体分门别类,少则十余类,多则六十余类,有的还在各类文体下再细分义类,虽亦难免琐碎,但确为读者掌握各类文体的特点、作法并按义类细目寻检鉴赏提供了方便,也为读者深入广泛地学习、领会、比较、借鉴古诗文提供了参考。

现代人编的古文选本大多按时代为序编排,如《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等。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文选”部分的次序安排,大致是既按时代,又按文体。

这本《古文分类导读》吸取了古今学者分类编选古文的经验,尝试纯按文体分类,将诗词曲以外的古文分为十二大类,力避琐碎,删繁就简。在每类文体中再按时代先后精选五篇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总共六十篇,详加注译,并进行提示分析。各类选文前集中介绍该类文体的源流、特点和类型,使读者结合选文切实了解各类文体的概

况。

本书编写者全都已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古文教学经验，因而编写中注意到古文阅读中如何掌握要点和特点，如何解决疑点和难点，确能使“导读”名副其实：循循善诱地、认真细致地引导、辅导、指导广大青年和古文爱好者以正确的观点、态度准确地理解、鉴赏历代古文名篇佳作，从而提高古文修养和文化素质。希望读者通过本书的阅读进一步从丰富多采的古文遗产中吸取精华，获得更多的营养和教益。

祝鸿熹

于杭州西溪杭大新村

序 二

我翻阅过应守岩副教授主编的《古文分类导读》的初稿，觉得很有特色，有些话想借此说一说。

一是按文类选文。文章分类，由来已久。很古的《尚书》，即有典、谟、训、诰、誓、命之分；稍后的《周礼》，亦有祠、命、诰、会、祷、誅之别。梁代萧统编辑的《昭明文选》，恐怕是我国第一部按文体汇集分类的文学总集，它把文章分为三十九类。前后数千年间，文章的分类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为此而著书立说的，按类而选文成集的，几乎是代有其人。毫无疑义，文章的任何体裁或样式，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体现了民族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特点，也蕴含了作者的创作经验和创作风格。正因为这样，按类阅读文章，就有利于了解每种文类的特点，了解各种文类之间的区别、联系以及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册按文类分编的古文选本，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和使用的需要。近十多年来，各种形式的古文选本已出版了不少，但按文类分编，这似乎还是独家首创。

二是同中学语文课本里选入的古文大致相关相应。这册书之所以分为十二文类，其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在现行中学的语文课本里，“史事”类就选有《曹刿论战》、《殽之

战》、《赤壁之战》等；“传记”类就选有《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等；“游记”类选有《游褒禅山记》、《满井游记》等；“论辩”类选有《过秦论》、《六国论》等；“序跋”类选有《伶官传序》、《指南录后序》等；……语文课本和这册书里选的，都是这些文类中的珍品名作。如能对照起来阅读，既立足于课文，又不局限于课文，“多加接触”，便可“普遍领会某一体文章的各方面”（叶圣陶语）。因此，该书的编写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是“导读”有方，便于自学。每类开头，撰写了有关知识的短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这类文体的渊源和特点。每类精选了五篇文章，每篇文章既有严谨的注释，又有精当的译文，还有富于启发的“赏析”，熔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通俗性于一炉，弘扬了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更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有大学的副教授，有中师的高级讲师，有中学的高级教师，他们几乎都教过中学语文，都有二三十年教龄，专业知识坚实，古文根柢深厚，教学经验丰富，对青年学生有更多的接触和理解，这就保证了本书的编写质量，保证了本书的适应性和可读性。

当然，要编写好这样的一册书，并非易事，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疏误。这册书如能得到广大师生的关切、喜爱，或提出宝贵的意见，那他们是非常高兴的，他们会在再版时把它修订得更好。

曹文趣

一九九〇年一月于杭州贡院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遗产和古代典籍的国家，读一点古文，了解一点古文化知识，对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历史悠久，古文遗产十分丰富。《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周文告和策书，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萌芽。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促使散文勃兴，《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既是史实的纪录，又是富有文学色彩的记叙散文；《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既是当时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各家政治主张、思想观点的哲学著作，又是富于文采、各具特色的说理散文。

秦汉散文是在先秦散文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箝制思想、摧残文化的专制统治下，秦代文学只出现一个李斯。他的《谏逐客书》指责秦王“逐客”的失策，词采华赡，笔势健举，富有论辩性和文学意味。其次是他的纪功刻石铭文对后世也很有影响。汉代是我国散文得到充分发展的时代。贾谊、晁错的政论散文（如《过秦论》、《论贵粟疏》等）关心国事，议论国策，铺扬蹈厉，情采飞

扬，既有议论透辟的战国纵横家的豪气，又有饱含感情的忧国忧民的情致，使人耳目一新。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把我国的史传散文推向一个新高峰。司马迁继承先秦史学的优秀传统和艺术成就，创造了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的纪传体文学，被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一反司马迁的观点，但却汲取了《史记》的写作体例和记叙技巧，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两本历史巨著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汉代也是我国各类杂体散文得到充分发展的时代，随着作者向着非政治家、非哲学家方向的异化，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就使散文的各种文体都得到发展，并出现了一些以写某类文体著称的著作家，如蔡邕以写碑文著称，孔融、曹植、王粲、阮瑀等，或善书记，或善表文，或善哀诔，这样，又反过来促使散文的各体都得到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也是鲁迅所说的是我国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和学术开始分道扬镳。这个时期散文的显著特点是：一方面散文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都不如先秦两汉，进入了“八代之衰”的时期；另一方面，散文的文体又有长足的发展和创新，出现了一种句式整齐、词语对仗、讲究文采的新文体——骈俪文。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庾信的《哀江南赋》以及陶宏景、吴均的山水短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流风波及，甚至象酈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这样的学术性很

浓的散文作品，也未能脱俗。

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唐宋散文，代表我国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和宋代欧阳修为领袖的两次古文运动，一方面是散文语言的革新运动，另一方面也是一次散文文体的解放和发展。茅坤认为韩愈“所著书、论、序、记、碑、铭、颂、辨诸什，故多独开门户。”（见《唐宋八大家文抄总序》）这话不无道理，如他在传统的论说文中，又开创了“原”、“解”各体。在序跋文中，又开拓了赠序文体。柳宗元不仅写有象《封建论》、《桐叶封弟辨》这样思想深刻、富有逻辑性的论辩文，而且他还使得山水游记成为独立的一体。欧阳修、苏轼等在汉赋、骈赋的基础上，摆脱了骈偶平仄的桎梏，创作了象《秋声赋》、前后《赤壁赋》这样一些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文赋。就是同是山水游记，也表现出同唐代不同的风格：唐人的工于描绘、富于感情；宋人的长于议论，富于哲理。不仅如此，唐宋的古文家们还运用文学的构思和形象化的手法，讲究起伏照应，工于修辞设色，刻画人物，描绘景物，抒写情志，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古代散文的艺术魅力，以致使得偏重实用的某些传统的书信文、公牍文、碑志文、哀祭文、箴铭文也成为具有欣赏价值的文学佳品，使人爱不释手。完全可以这样说，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文体臻于完备而极为发达的时期。

自入元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开始兴起，并成为文学上的主要成就，而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却走向衰落。但就散文而论，也并非毫无成就可言。元

代散文寥落，但吴澄的《送何太虚北游序》、虞集的《尚志斋说》等文章却不乏光彩。明代散文开始中兴，刘基的《卖柑者言》、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王守仁的《瘞旅文》以及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等都是文质兼美、脍炙人口的佳作。尤其是唐宋派的归有光，其抒情叙事散文继承了苏轼开创的抒情性文艺散文的传统，形成自己以生活中的小事为题材，语浅情真的散文艺术特色。以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反对拟古、复古，主张抒写性灵的旗号下写了不少富有现实意义并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散文作品，开拓了杂文和小品文的领域，扩大了散文的样式。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由于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实现思想箝制政策，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中出现了“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恐惧心理，趋向整理国故、埋头学问，散文创作极为沉寂。直到清中叶，以方苍、刘大魁、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他们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的主张，写了一些较为可取的作品，如方苍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才给清代的散文园地带来一丝生气。而真正打破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腐朽局面的是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龚自珍。在古文写作上，他“以经术作政论”，使学术思想与现实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写了不少政论文。他的记叙散文《病梅馆记》以植梅、疗梅为喻，抒发了反对束缚、渴望自由、鼓吹解放的思想感情，给人思索和美的享受。

综观我国古文的发展历史，可以知道，我国的古文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作家众多，作品繁富，不仅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而且佳作纷呈，众体毕备。那些第一流的散文作品，第一流的散文作家，即使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也当毫无愧色。过去，这份丰富的文学遗产曾经影响着我国一代代的知识分子，滋润出一代代的学者、作家，今天，它必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二

古代文章都有一定的类别和体式，而每种类别和体式又各有它自身的特点。因此我们学习古文，就需要懂一点文体知识。这是因为：古代的文体知识，是古代文化知识的一部分，而对古代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是一个人文文化素养的重要内容。更主要的是，因为文体的不同，往往反映了语言形式的不同和内容要求的不同。我们如能掌握了各种文体知识，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就能提高我们对古文的阅读鉴赏能力。

文体知识的内容很多很丰富（古人是把它当作一门科学，即文体论进行研究的），我们需要了解哪些知识呢？

一是文体分类的知识。

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对文体的类别已有所认识。《诗经》中风、雅、颂的划分，说明当时已经对诗歌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分类。《尚书》中有典、谟、训、诰、誓、命的名称，说明同是官方文告，由于用途的不同而出现体制上的

差异。但真正对文体进行分类研究的，大约开始于东汉，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先秦时代，诸子散文，文、史、哲不分，学者自成一家言，编有专集。历史散文，或按年代编纂，或按国别结集，也都是整部著作。而不管何种著作，就文体而言，或记叙史事，或论辨析理，都比较单纯。但自两汉以来，不仅著作家渐多，而且文体也向多元化发展，且多单篇文章。如《后汉书·冯衍传》记冯衍“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书中记载，何等繁琐，而结成文集，把这种杂著，纳诸文集之中，那就只须说文集几卷好了。而要编成文集，按什么体例编纂，才能眉目清楚？于是就产生按文体分类的编纂法。尤其到了魏晋之后，许多能诗善文之士，都有文集传世，而且文集中具备各体，佳作屡见，因而就有选录诸家作品的总集出现，于是文体归类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正如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郭绍虞教授所说的：“文体分类的开始，由于结集的需要。”（见《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是很有见地的。

对文体进行分类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东汉末年的蔡邕曾把皇帝对大臣的文告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把臣下给皇帝的奏议分为章、奏、表、驳议四类。魏晋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类。陆机的《文赋》把文体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六朝时候，刘勰在《文心雕龙》这一文学理论巨著中，仅二十一篇以文体标名的文章中就论述了三

十四种文体。萧统在我国第一部按文体聚类区分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中把所收的作品分为三十九类。宋代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分为五十五类，姚铉编的《唐文粹》分为二十二类，各类下又分子目三百十六。南宋吕祖谦的《宋文鉴》分为六十一类。元苏天爵的《元文类》分为四十三类。明吴讷的《文章辨体》分为五十九类。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在《文章辨体》一书的基础上增广为一百二十七类。清代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把选录的古文辞赋按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和哀祭十三类。由此可见，一方面，文体分类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也说明了文学观念的变化和进步；人们细致地区别不同文体的特征，为新文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古人在区分文体时标准还不统一，有的简要，有的繁琐，而且也有矛盾交错的情况。从中可知文体分类的复杂性。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去记住所有这些文体，但对古人文体分类情况要有所了解，能够把我们所接触到的古文或按语言形式，或按内容性质，或按应用范围进行归类，这也是必要而应该的吧！而这就需要懂得一点文体分类的知识。

二是文体特点的知识。

宋人倪思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也。”明人陈洪谟也说过：“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体者，文之干也；意者，文之帅

也；气者，文之翼也；辞者，文之华也。体弗慎则文庞，意弗立则文舛，气弗昌则文萎，辞弗修则文芜。”这都说明文体的重要性。作文章首先要把握文体，这道理也是容易理解的。每种文体都是适应一定的需要而产生的，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体例形式和风格特点，论说有论说的规模，传记有传记的体例，奏议有奏议的格式，箴铭有箴铭的要求，如不懂它们的特点，格式错用，措词失当，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即使有闪光的思想、精工的文辞，也无补于事，而影响其效用，见笑于大方之家。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尝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并把它当作“古文十弊”之一。文中说，有一名士带着母亲的行状（生平事略，供作墓志用）请朱筠先生作墓志。行状中叙述母亲的节孝，其中写到祖父晚年病废卧床，便溺无时，家中无次丁（指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十五岁的男子），其母不避肮脏，亲自给祖父洗涤烘衣。这事情本令人称颂，但行状又写到其祖父于时蹙然不安，其母就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侍奉八十老翁，何嫌何疑？”作者叙述此事后感叹说：“呜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志铭文是称赞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的文体，它的特点是称美不称恶。母亲服侍公公，本无芥蒂，而添加母言，却无故而自生嫌疑，反而影响其祖其母的品格，因此作者讥为“挖肉为疮”之弊。这种看法从思想观念上看未免道学气，但就文体要求而论，却并不是全无道理的。因此元潘昂霄说：“学力既到，体制亦不可不知，如记、赞、铭、颂、序、跋，各有其体。不知其体，则喻人无容仪，

虽有实行，识者几人哉？”（见《金石例》）此语可谓切中肯綮的。

当然，上面说的是了解文体的特点和体式对于写作的重要意义，虽然对我们今天的写作会有所启发，但我们究竟没有必要去写古代的各种文体。但懂得文体的特点和体式，对于我们阅读古文有帮助。初中语文教材第一册有一篇《黔之驴》，它是柳宗元《三戒》中的一篇。（其他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戒”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戒”是一种文体，用以告戒警醒，既可对人，也可对己。明白这种文体的特点，就可以了解，作者实际上是用“黔之驴”的故事比况人事，讽刺那些过高估计自己，外强中干的人。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思想内容，进而领会设喻的手法和形象描绘的艺术特色。又如高中语文教材第六册有韩愈的《原毁》一文，“原”是什么意思？原来“原”也是一种文体，是古代论说文体中的一种，是“推本求原”的意思，是专门用来推论事理的文章。因此，“原毁”就是探求毁谤的根源。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文体的特点来分析内容，体味特色，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样的道理，我们要读懂刘禹锡的《陋室铭》就要懂得“铭”这种文体的特点，我们要深味袁枚的《祭妹文》的感情，就要了解祭文这种文体的要求……。总之，我们在阅读古文时，要有文体意识和文体知识，才不致于盲人摸象，茫无头绪，而能读得通达，学得有成效。

三是文体流变的知识。

我国文学发达，文体繁富，样式众多。而每种文体都